

希望的逆变：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意义假体化与集体空转

作者 张琼 · SDE 学员 · 约 2.3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8月3日 · 深化增补版

摘要

本文判定，韩炳哲在《希望的意志》中预设了一种尚存于个体生命中的“意义余热”——一种即便被耗尽也能通过与他者连接被重新点燃的内在生命力。本文撤销这一预设，论证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意义的衰弱并不取朽坏或压抑的形态，而是被一套高度便利的“意义发生假体”系统性地替代。这一替代并非压抑的加深，而是发生条件的置换：三类假体——选项界面、数据外包、即时满足——按特定时序逐步替换了意义发生的三重节奏（自由踩路、创造认路、幸福走路），使意义器官从“萎缩”走向“功能真空”。当替代完成，人已不是“枯竭但尚有余温的主体”，而是意义器官已长成假体组织的另一种生命形态——连接不再点燃希望，连接只能将彼此的空转同步为一场共振的、更不易被察觉的集体耗竭。本文将这一手术命名为“意义器官的假体化”，并据此提出：希望的瓦解不是主体放弃未来，而是假体化使“向未来开放”这一能力本身被摘除；由此被号召的希望，退化为对尚未到来的奖赏的认知性押注。假体化诊断将本文与自我决定理论、心流模型、Ehrenberg的疲于做自己、高兹的非物质劳动批判等框架彻底分离，对马克思以降的异化传统做出原则性划界，并与斯蒂格勒的器官学展开深层对质——辨明“器官被摘除”与“知识被夺走”之间的本体论差异。本文指明希望政治不可绕过的地基：重建能从假体化机制的逆转点导出、而非从日常智慧借来的微观条件——庇护茫然不被截断、为前反思裁定留出不被数据穿透的缝隙、恢复被切碎的张力弧线、让连接成为共护缝隙的共振场。若在高度假体化的社群中，仅凭共同话语与集体叙事就能让个体恢复完整的节奏与内在生成力，则本文从根上错；若介入照护关系中那些正在变薄的“厚土”而无法观测到替代减速，则假体化作为独立驱动力的解释力被削弱。

关键词 希望；假体化；意义发生；韩炳哲；数字资本主义；斯蒂格勒

一、问题的裁定：不回答韩炳哲，撤销他的地基

韩炳哲于2024年出版的《希望的意志》，在其思想轨迹中构成了一次令人深思的位移。这位以解剖“精神政治学”著称的思想者，长期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下一项反直觉的运作：权力不再以禁令的面貌出现，而是让个体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驱动下，心甘情愿地自我榨取。《倦怠社会》中的功绩主体，正是被这种以自由为燃料的奴役机制榨干的人。

因此，当他突然转向“希望”这一范畴，试图在恐惧弥漫的时代——疫情、气候危机、技术威胁与战争——为孤立化的个体找到一种连接彼此的力量时，这个转向本身就是一份症候。它暗示：韩炳哲此前描绘的那套让个体自愿耗尽自身的精进系统，已经逼近了临界点。连解剖者都感到，光揭露不够了，必须给出点什么。恐惧使人孤立，希望使人连接——这个简洁的二元对举，成为他新书的核心姿态。

坦率说，本文不打算承接或反驳这个姿态。本文要走另一条路：检查这个姿态所站立的那块地基，是否本身已经塌陷了。

这需要先做一个裁定。韩炳哲在使用“希望”这一范畴时，默认了一件事：不管个体被系统耗竭到什么程度，他／她的内部仍然残留着某种可以被唤醒的东西——某种一旦与他人连接，就能重新燃起朝向未来的热量的内核。这份默认绕开了一个更根本的追问：耗竭的尽头是什么？如果耗竭不只是“累了”“枯竭了”“不想动了”，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的替代——维持意义发生的器官本身，已在漫长的“便利”中被换成了假的——那么，当这样的个体被号召以希望连接时，连接的是什么呢？

这个追问，不能通过对韩炳哲文本的精细解读来回答。因为韩炳哲的文本已经站在了那个被本文怀疑已经塌陷的地基上。他讨论希望，预设了“尚能希望的个体”的存在。本文要检查的，恰恰是这块地基以下更深的那个齿轮：在韩炳哲号召希望的那片社会土壤里，个体“能希望”的器官本身，是否已经被另一套更顺滑、更无痛、更不留下反抗对象的假体系统摘除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连接”这个动作就不再是希望的发生场，而可能恰恰是假体之间的共振——它看起来很像希望，但什么也没发生。

这不是跑题。这是对分析单位的校准。韩炳哲的“希望”作为一个理论对象，其分析单位是“政治想象”：他试图论证，一种集体的、朝向未来的积极态度，可以成为对抗恐惧的政治力量。这个单位切不出那个更根本的机制：一个人为什么能或不能产生朝向未来的、带着确信的期待？这个机制不在政治想象的层面，也不在心理需求的层面——它在那个被数字资本主义悄悄改造了的、意义发生的器官层面。

本文因此改切问题。不追问“韩炳哲的希望转向是否有效”，而是追问：在韩炳哲号召希望的那片社会土壤里，个体内部那个能让希望发生的结构本身，是否已在结构上被另一套东西替代了？如果替代已经发生，那么“希望使人连接”这句话就该被倒过来写：试图用连接来催生希望的努力，很可能只是在让一群已经被替代了的器官，彼此共振出一片更大声的寂静。

裁定的脚印留清楚。问的是：韩炳哲的“希望转向”是否有效？本文判定：该问题的分析单位（政治想象）太粗，切不出“连接中的个体还能否发生希望”这一更根本的机制。因此改问：在韩炳哲号召希望的那片社会土壤里，个体内部的希望发生器官，是否已被结构性地假体化？理由是：如果假体化已经发生，那么韩炳哲所预设的那个“尚能被希望填满的主体”，就不是被耗竭了，而是被换掉了。下文不再与韩炳哲的文本正面交锋。他在本文中的位置，不是理论对手，而是症候——他转向希望这一动作本身，作为一份档案，记录了系统的替代手术已经推进到了哪一步。本文要做的，是把那个手术的切口重新打开，并在打开之后，与那些同样处理“主体被掏空”的理论传统做一场正面的、关于不可替代性的划界。

二、希望的呼吸：三重节奏作为意义发生的联合引擎

在检查那座地基是否已被替代之前，必须先说清一件事：当一个人“有希望”的时候，他／她的内部在发生什么？不是给希望下一个发现学的定义，而是追溯它的发生学结构——希望不是一枚被颁发给好学生的奖章，它是一段正在身体里运转的、三重咬合的同时态节奏。

但在此之前，必须先做一个自我校正。本文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从“孩子捡石头”这一现象学场景出发，拆解三重节奏的运转方式。然而，这个场景本身并非一个永恒的、去历史化的人性结构。三重节奏——自由地踩路、创造地认路、幸福地走路——之所以能在这孩子身体里完整地运转，本身需要一系列特定的社会条件：他有一片不被催促的河滩、一个不被成人的评价体系定义为“无用”的下午、以及在他内部尚未被“做这件事有什么用”的追问提前截断的感受力。这些条件不是天然的，它们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被发生出来的——如第五节将要论述的，它们属于那种“太慢、太厚、无可替代”的社会关系的沉淀产物。三重节奏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在特定条件下被发生、被维持、也可能在另一些条件下被打滑、停转、乃至被假体置换的发生结构。这个认识，将使本文的发生学立场更加彻底——连希望的器官本身，也是被发生出来的。

现在，让我们进入那个场景。一个孩子蹲在河滩上捡石头。没有任何人要求他捡，也没有任何标准告诉他哪块石头值得。他蹲下去，拨开沙子，拿起一块端详，觉得不对，放下；再拿一块，翻来覆去地摸，放进兜里；走几步又掏出来看看，最终有几块被带回家，另外一些半路就丢了。当我们仔细看这一个小时里发生的事，会看到三件事不是先后发生，而是同时在一具小小的身体里卷动。

第一件事，是他能在无路处碾出路来。整个河滩对这孩子而言是一张没有任何箭头的白纸。他不是两条标着“捡”和“不捡”的岔路之间做选择，而是在无尽混沌里硬生生踩出自己的一串脚印。蹲在哪里、翻哪块沙、什么时候认定“不对”、什么时候眼睛一亮——每一步都没有外部依据。他承受着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茫然，承受着捡起来又放下的小小挫败，最后那条弯弯曲曲的路线是被他自己的脚踩实的。自由的实质不是选项的多少，而是这条弧线能在身体里从头跑到尾：茫然、试探、挫败、调整、再试探，直到那条路被踩出来。这种“我自己踩出路来”的身体记忆，是希望最深的底气。一个人在困境中还能相信“有路可走”，不是因为有人告诉过他路在哪儿，而是因为他的身体记得：我曾经从无路处踩出路来过。

第二件事，是他能在做的过程中认出“这是我的”。那孩子捡了十几块石头，大半都丢了。他丢掉的每一块，都做了一次前反思的裁定：不是根据成色、重量、类别这些外部标准，而是根据一种他无法清晰表述的身体感觉——“不对，这块不是”。直到某一块被他反复摸、对着光看了又看、最后攥在手里不肯扔的石头，让他心里一动：“就是它了。”这个“就是它”的发生，没有经过任何外部尺度的衡量。它是数以百计的微小裁定——拿起、放下、不对、再往那边一点——累积到最后，从混沌里浮出来的那个形状。创造的本质不在“造出新东西”，而在“认出那个从未见过、却第一眼就知道该从自己手里长出来的东西”。创造在时间上的纵深，为希望提供了另一种确信：我不光能走路，我还能在走过的路上认出属于自己的方向。

第三件事，是他体验到了张力被完整走通的充盈。那孩子找石头的整个过程，是一根绷着的弦：期待、摸索、受挫、再试、突然通了。当他终于把石头攥在手心，那一口气从紧绷到释放的完整弧线倏地流过身体——那不是“得到了”的快感，那是张力被走通的充盈。幸福不是奖赏的降临，而是这件事从头到尾被跑完的当下身体经验。一个孩子做一道很难的数学题，抓耳挠腮之后突然通了，那个“通了”的一瞬就是幸福。这道题如果是别人一步一步喂出来的，他做对了也没有这条弧线——张力被外部拆掉了，没有流过自己。幸福是希望当下的储能：每一次弧线完整地流过身体，就在内部存下一笔“节奏存款”。日后在更大的困境里，身体能从中提取一种根本的确信——我曾经把一件事从紧绷走到释放过，我是能走通的。

这三件事不是三种独立的“能力”，而是同一台三联引擎的三个齿轮。茫然中碾路（自由）为裁定提供原料——不去无路处踩，就碰不到那块需要认领的石头。裁定中认路（创造）为走通提供附着——没有一个“这是我的”的东西撑着，张力就没地方可以绷。走通中释放（幸福）反过来为下一次碾路和认路供燃——身体里存下的那笔存款，是下一次敢迈进茫然的底气。希望，就是这台三联引擎正在同步转动的过程本身。它不是一项指向未来的期货，也不是一种可以单独存在的信念状态。一个人此刻正在自由地踩路、创造地认路、幸福地走通路——这个人不需要被号召“要有希望”，他已经在希望之中了。

由此可以看清，希望的瓦解是怎样发生的。不是一个人有一天突然决定“我不再相信未来了”，而是这台三联引擎的某一个齿轮开始打滑、咬不住、停转。当茫然不再被允许——每一丝不知所措都被迅速推入一个选项菜单，人便不再踩路了；当裁定不再被需要——外部数据比内部感觉更快、更准地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人便不再认路了；当张力不再被走通——每一段弧线还没跑完就被即时满足截断了，人便不再走通路了。而当这三个齿轮同时打滑时，人不会立刻惊觉“坏了，我失去了希望”。他只是觉得一切仍在运转——因为他仍在选、仍在做、仍在被满足。但运转的那台机器，已经不是他自己的引擎。那是另一台东西。

三、替代的时序：意义发生器官的假体化过程

那台“另一台东西”是什么，如何被植入的，它是否真的替代了原初的引擎——这是本节要打开的切口。

需要先做一个概念澄清。本文使用的“器官”与“假体”均为分析性比喻，不指向生物学或医学意义上的实体。“器官”指涉的是那套能使意义在个体内部自行发生的结构——它包含但不限于：承受茫然的能力、做出前反思裁定的能力、将张力走通的能力。它不是某个脑区的功能，也不等同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系统”。它是一个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被发生、被维持、也可能被系统性拆解的发生结构。“假体”指涉的，则是一套功能仿真、但不再由个体内部生长出来的外部替代装置——它提供与真器官相似的功能输出（选出一条路、得到一个结果、获得释放感），但其运转逻辑、反馈机制与反向介入的可能性，均由平台结构预先封闭。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定生态里，个体内部那台三联引擎不是在运转中被压坏、磨损或压抑，而是被一套顺滑的、几乎无痛的工程技术系统性地置换。压制留下反抗，磨损留下残骸，这两者都还意味着真器官尚在。置换——一旦完成——人不再怀念真器官，因为假体提供的体验已足够仿真。这就是本文要命名的那个结构：意义器官的假体化。

然而，仅仅并列地描述三类假体的功能，仍不足以构成一个发生学的论证。发生学不能只说“三个东西一起替换了三个东西”——那仍是将替代理解为同时态的、无先后的覆盖，而非一个有驱动关系、有结算与回写的生成过程。必须回答：替代从哪一处开始？最先被撬动的是哪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停摆如何为下一个齿轮的替代打开方便之门？假体之所以能完成替代，不是因为它比真器官“更强大”，而是因为它沿着真器官内部矛盾已经累积到临界点的那条裂缝，第一个楔子敲了进去。

这个最先被敲开的裂缝，是创造。准确地说，是创造弧线中被数据外包悄然拿走的裁定环节。在一个尚未被数据全面中介的环境中，个体的每一个创造动作——无论是写一段文字、做一个设计、拍

一条视频——都必然经历一段混沌期：东西做出来了，但“对不对”没有外部标准可查。创作者必须反复端详、推倒、调整，仅凭一种“总觉得不对”“再往那边一点”的内部感觉，独自做出数以百计的微小裁定。这个过程是焦虑的、费力的，但它是创造弧线不可绕过的核心——因为它逼着个体在混沌中逐步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裁定尺度。这套尺度不是学来的，是磨出来的。

数字平台提供的整套数据工具——实时数据面板、A/B测试、点击率、转化率、用户画像——恰恰是用来替代这个过程的。它们比内部感觉快，比内部感觉准，比内部感觉更“客观”。一个视频内容创作者最初可能是凭“手感”来判断自己该拍什么类型的视频——他反复试、反复看观众的反响，在漫长的摸索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判断直觉。但当他开始使用平台的创作者后台，他看见了那个实时更新的数据面板：每一支视频的点击率、完播率、互动率，都被拆成了精确的数字。他很快发现，凭“手感”做出来的东西常常数据平平，而数据给出的方向——那些系统提示的“高流量话题”、模仿头部创作者的结构套路、顺应热点的内容——能更快地带来增长。他每一次按照数据调整方向，都是在做一次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但这个过程日复一日地重复，他内部那个“总觉得不对”的身体感觉被一点点替换成“数据说这样不行”的理性决策。裁定被外包了，创造弧线被绕过了。

这就是假体植入的第一环。它的逻辑不是外部力量用暴力剥夺了个体的裁定权，而是一个更舒适、更准确、更被数据验证的外部标准，在一个高度不确定、需要反复承受“我不知道对不对”的焦虑时刻，向个体伸出了平滑的援手。这个“援手”本身并没有出问题——它出问题的地方在于：每一次使用它，都等于豁免了一次个体在混沌中独力做出裁定的机会。而裁定能力，恰恰不是一项可以“先外包、以后再学回来”的技能——它是一块只能在黑暗中反复摸索才能长出来的肌肉。数据外包不是挫伤了这块肌肉，是让它从未有过被使用的理由。

创造弧线一旦停摆，矛盾便开始向自由弧线传导。裁定能力衰退造成了另一种不可见的后果：个体对“这是我做的”这件事的身体记忆急剧减少。当一个身体不再记得自己曾经从混沌中亲手认领出一个东西时，它同时也丧失了另一种能力——在茫然中相信“我找不到路，但我能踩出一条来”。这种能力正是自由弧线的起点。自由不是选项的数量，而是一个人敢不敢在没有选项的地方迈出第一步。而敢不敢迈步的底气，恰恰来自那个人曾经在创造弧线里反复体验过的“我曾认出路来过”的身体存款。

当这笔存款被提取殆尽，茫然就不再是探索的前奏，它变成了纯粹的恐惧——一种在没有选项的真空中的功能性瘫痪。在此刻，选项界面作为第二件假体，恰好填补了这块恐惧。算法推送的不是暴力，而是某种温和的紧急救援：在你还没感受到茫然的全部重量之前，一组“你可能感兴趣”的选项已经出现在眼前。它替你吧混沌填平，把十字路口变成了自助餐台。选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准，但那是在逛超市，不是在踩路。这个假体化的完成标志，不是人不再自由，而是他遇见一个没有现成选项的人生困境——要不要分手、该不该辞职、往哪个方向走——时，第一反应不是“我踩一条看看”，而是“我找不到该选哪个了”。这不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自由弧线赖以开始的那个茫然孵化器的结构性拆除。

继而，第三环打滑的是幸福弧线。幸福与满足本质上不同。幸福需要一条从紧绷到释放的完整弧线，需要张力在时间中累积、凝聚、最后在某个无法被预判的时刻忽然松掉。但一个已被数据外包和选项菜单重新格式化的身体，恰恰无法承受张力的缓慢累积——因为它已经习惯了“不知道该怎么

办”的焦虑被迅速化解，“不知道对不对”的不确定被立即消除。即时满足作为第三件假体，完美地契合了这个被驯化后的身体节奏：每一次点赞的响起、推送的刷新、购买的确认，都是一条被极速压缩的弧线的碎片。这些碎片不需要茫然的孵化，不需要裁定的焦虑，不需要漫长的走通。它们提供的是化学快感，而不是意义释放。更致命的是，它们在提供快感的同时，也持续地消耗着身体内部那股需要被缓慢积累的张力水库——每一次即时满足，都等于在绷紧的弦上偷偷钻了一个小孔。弦被拧紧的频率没有减少，但水位却再也蓄不到可以冲开堤坝的高度了。

三条弧线的逐环停摆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时序：裁定外包拆除了创造，创造存款的枯竭削弱了直面茫然的勇气，选项菜单填平了茫然的孵化器，张力走通的条件被移除后，幸福沦为永不完成的碎片。这是一个由矛盾传导出来的替代过程，而非三件同时发生的外部入侵。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假体替代的不是器官的“好”，而是器官的“费力”。茫然很费力，所以被选项填平；裁定很费力，所以被数据外包；走通弧线很费力，所以被即时满足短路。数字资本主义提供的新型便利，精确地击中了这台三联引擎最脆弱、最需要呵护的那三个耗费心力的节点。假体的植入逻辑不是外部的强权压迫，而是对一个正在费力运转的肉身发出的、持续不断的舒适邀请。

现在，可以说清“替代”的判准在何处了。真器官并非被“撤销”——它从未在物理意义上被切除。它发生的是一种更彻底的退场：它赖以运转的特定社会条件（允许茫然、允许混沌裁定、允许长弧线走通）被平台结构系统性铲平，同时一套功能仿真的假体被植入进这些被铲平的空隙里。器官仍在身体的某处——就像那块从未被使用过的肌肉仍然挂在骨骼上——但它已失去了被激活的理由。当“没有菜单就不知道怎么迈腿”的瘫痪在无数日常场景中被反复触发，当一个人被移入一个没有任何推送、没有即时反馈、必须自己从茫然里做出判定的环境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重新站起来的力气，而是一种不知道该如何站立的茫然的恐惧——那个时刻，替代便完成了。它完成的标志，不是真器官被消灭了，而是它对个体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可用的、可信赖的、会被第一反应召唤的内在驱动源。

四、空转的连接：被号召的希望如何共振为虚无

行文至此，假体化作为一项替代手术，其内在时序已经被铺陈出来了。现在可以回头审视第一章提出的那个问题：当连接在一起的个体，其意义器官已被假体化——自由已退化为选项勾选，创造已退化为目标交付，幸福已退化为即时满足——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答案不是一个更微弱的希望，而是一个可能比假体化本身更难被察觉的现象：连接本身，会变成假体联动的最强放大器。这些个体带入连接的，不是意义存款，而是彼此的空转。他们的连接，不是两条活着的弧线的共振，而是两台假体联动的同频。一个人在选项超市里选得焦虑，向另一个人倾诉；对方回应了他的焦虑，分享了自己在同样超市里的选项策略。他们彼此安慰，彼此确认——他们以为是在互相支撑，实际上是在互相校准彼此的假体。焦虑没有变成踩路的动力，焦虑在两个人的来回确认中，变成了一种共享的、被合理化了的状态。

这就是假体化之后连接的真正形态：共振式空转。它很像共振——彼此的频率被同步，彼此的焦虑被共享，彼此的无奈被确认。但它什么也没产生。自由弧线没有被激活，因为两个人交互的始终是选项，不是茫然；创造弧线没有被启动，因为他们交换的是外部目标的效力，不是内部裁定的不确定；幸福弧线从未流过，因为每次连接给出的不是“走通了”的释放，而是“我也一样”的短暂安

慰。连接越紧密，空转的同步性越高——教育焦虑的家长群里，大家分享信息、讨论策略、彼此倾诉，情感是流动的，信息是丰富的，但每个人都更牢固地锁死在原来的选项超市里。因为任何一个人想要走出去为自己的孩子踩另一条路，就会被群里的其他人视为不负责任。这个群连接，不是滋养自由，而是给自由加了一道集体锁。

韩炳哲的“希望政治”在假体化语境下，恰恰陷入了这一最深困境。当一群意义器官已被替代的个体被号召以希望连接时，连接所催生的，不是当下发生的三重节奏，而是对未来的认知性押注——一种“我们在一起，所以未来一定会变好”的信念。这个信念没有身体的底子。它没有一个曾经自己踩出路来、认出路来、走通路来的身体记忆作为支撑。它只是从恐惧里被逼出来的最后一管情绪燃料。而这管燃料烧不了多久，因为它不产生新的燃料——假体不生产节奏存款，它只能一波又一波地从恐惧里挤。这正是自我榨取的最后一个形态：连对未来的期待，都被征用为当下空转的燃料。

现在可以做那个比喻了。假体化的人，像一块一块被掏空了的木头，表面还保持着木纹，内里已被一种轻质、发泡、看起来很像木头的材料所填充。两块原木相敲，发出沉闷的、结实的声音。两块空心木相敲，发出的声音更脆、更大、更好听——但那是空的声音。韩炳哲号召这些木头在风暴中团结起来。它们一起敲击，声音响彻山谷。但风暴并没有被这声音止住，因为它们不是树，它们是空心木。它们敲出来的声音再大，也扎不进土里，也挡不住风。

然而，这种全称式的修辞需要一个自我设限。必须追问：假体化的“空心木”是否覆盖了一切连接？在数字平台上的虚拟社区、粉丝社群、同好圈子里，大量用户确实声称在那里找到了归属感乃至意义感。如果这些人感受到了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归属、真实的“被看见”，那么将他们的连接一概斥为“空转”，不仅是一种经验上的武断，也会使本文的诊断失去可证伪性。

对此，本文提供一条判准。需要区分两种“意义感”：一种是在连接中自发产生的、伴随着“我在其中自己做出了什么”——哪怕只是为朋友的帖子写了一段真诚的回应、在一次粉丝创作中认出了一个只有自己觉得“就该这样”的细节——这些时刻，是三重节奏在假体环境中偶然发生的短路式复苏。这些时刻是真实的，但它们发生在那里的原因，不是因为平台创造了它们，而是因为参与者的真器官尚未完成被替代，或者是真器官在这一段特定的交流结构中找到了一个统计上微小的缝隙。

另一种“意义感”，则是假体联动的精密版本。它同样让人感到温暖、被认同、有归属，但这种归属不是由“我自己做了裁定”产生的，而是由算法精准匹配到了一个与我预存偏好高度一致的结构所产生的“无摩擦的共振”。我在里面待得越久，越觉得“这就是我的圈子”，但同时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个后果：我对这个圈子内部的反驳能力越来越弱，对离开这个圈子的选项越来越恐惧，我对“我是谁”的定义越来越依赖于这个外部结构给出的分类标签。这种意义感不来自器官，它来自假体之间的同步校准——它让人舒服，但它不让人生长。判准至此可以更清晰地落地：一个连接环境是否在实质性运转真器官，不在于它是否让人感到有意义，而在于参与者是否在其中经历过茫然（因为遇到了圈子内部难以消化的矛盾而暂时搁浅）、是否做过反于自身舒适一面的前反思裁定（“我曾经坚信的东西在这里被撬动了一小块”）、是否体验过张力被走通的释放（“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但它终于在我的内部被想通了，不是因为群主给了答案”）。如果一个连接环境长期无法出现这四种状态——茫然、裁定、张力、走通——那么它的“意义感”有极高的概率是假体联动的产物，而非希望的土壤。

五、假体化的边界与梯度：在哪些泥土里它长不进去

假体化的诊断若不通往边界意识，就会滑向一幅全称的黑暗图景：所有人都已经被掏空了，所有的连接都只是空转。这既不是事实，也不是本文的立场。假体化的生长需要三类条件：一个能即时反馈数据的环境，一个能把茫然迅速填平成选项的机制，一个让人不必把一件事从头走到底的、可随时跳转的跳轨结构。这三类条件在某些社会关系中齐备，在另一些关系中则天然缺失——后者不是假体还没长进去，而是它们的结构使假体化不可能。

最典型的“假体不长之地”，是那些纠缠得足够厚、慢得足够稠、无可替代的照护关系。一个长期照护卧病在床的母亲的女儿，日复一日为母亲翻身、擦洗、喂食。这件工序没有任何数据反馈——翻身翻得再好，平台不会给你点赞；它也没有选项菜单——没有算法能替你决定今天用哪种方式擦洗更优；它更没有“跳轨”的可能——你不能因为翻身太重复就切换到擦窗的轨道上去。整件事的结构，就是一条没有任何外部参照、没有任何即时奖励、没有任何捷径的张力弧线。它很费力，但那费力是真的费力，不是被假体模拟的费力。它很漫长，但那弧线是完完整整地流过身体的——从开始翻身，到翻好、把被子掖好、看到母亲表情松弛了一点，那一刻，紧绷的弦松开了。幸福律在运转。

更宽阔地看，许多面对面、不依赖数据排名的共在实践——一群人在房间里不为了发表观点而读书、一个从不参加比赛的合唱团、一场只为了把手弄脏的陶艺课——都具有这层结构：它们太慢了，慢到算法抓不住；太厚了，厚到无法被切碎推送；太独特了，独特到没有任何一个选项菜单能够替人做裁定。在这些关系里面，假体长不进去。三重节奏尚能完整地、笨拙地、从头到尾地流过身体。

但必须立即澄清一个容易被误读的点。本文将这些地带称为“厚土”，不是在声称它们是某种本真的、未被污染的净土。照护关系同样被外卖平台侵蚀着：一个照护者用外卖解决了那顿饭，似乎解放了时间，却也切掉了“从准备食材到看见亲人吃完”那段弧线的一段。短视频填进了照护间隙的茫然，似乎安慰了照护者，却也把那片“在茫然中自己长出节奏”的孵化器填平了。厚土之所以能抵抗，不是因为它们“更真实”或“更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结构中某些特征——太慢、太厚、无可替代——使假体难以拟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解释，不是价值性的颂扬。抵抗源于结构特征，而非价值纯度。

侵蚀不等于置换。照护者仍在许多时刻回到那条没有外部参照的弧线上，用自己的手臂把自己的身体跑完整。他的器官还在，只是身边越来越吵了。而在另一些领域——高度数据化、高度算法中介的职业与生活方式里——替代已经完成得那么彻底，以至于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原器官跳动的感觉。因此，假体化不是一个有/无的二分，而是一道梯度。本文所命名的“假体化”属于这片土壤上正在发生的一种持续的替代运动，它的推进速度因土壤的厚薄而不同。任何一个声称要回复“希望”的方案，都必须正视这片厚土的存在——它是重建的地基，也是测量置换速度的标尺。

需要补充的是，这道梯度不是一个静态的分层图，而是一个充满争夺、推进与撤退的动态演进。为此，本文引入一个必要的中间案例来呈现厚土被侵蚀的过程——而非仅仅陈列抵抗成功的一端。一个原本不追求名次、不对外演出的社区合唱团，成员们聚在一起只为了唱歌。多年之中，选曲、排练、声部分配的每一个决定，都由成员内部商量着做出——有人提议一首老歌，有人反对说太难，最终排出来的是大家一块摸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典型的厚土区域：裁定来自内部的集体磨合，弧线完整地第一次排练走到演出的那一刻。但自从有人把排练片段传上短视频平台后，外部的数据反馈开

始渗入。评论区告诉你哪段高音最受欢迎、哪种改编更有流量，甚至有成员提议按照流行趋势来调整曲目。合唱团没有被解散，它仍在排练、仍在唱歌，但选曲的依据中已经混入了那一层从未被当面讨论过的外部数据逻辑。裁定的一半被外包了。它还没有变成假体联动，但它正在变薄。这个中间案例的意义，不是展示某种无法阻挡的衰败，而是标定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在厚土尚未完全被铲平、假体尚未完成替代的那一刻，介入仍然有效。这个窗口，正是重建所必须踩住的时机节点。

六、空转的苦：假体化时代的痛苦形态

假体化的特质是它让人舒服地失去，那为什么这个时代弥漫着如此普遍的抑郁与焦虑？如果假体真的如它所描述的那样顺滑，为何人仍在痛苦？

这个追问必须被正面回应，否则整个诊断将显得与最基本的日常经验相悖。答案是：假体化并不消除痛苦，它消除的是痛苦能被走通的那种结构。它把痛苦从一种可以被完成的弧线，变成了一种找不到出口的漫灌。

真器官的痛苦是有节奏的：绷紧、受阻、再试、突然松掉。身体在那条弧线里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难受，也知道熬到哪一步会松——那份知道本身，就是希望的细胞。假体化的痛苦却把这整条弧线切碎。张力仍然在产生——社交比较带来的挫败、信息过载带来的焦虑、被数据指标追赶的压迫——但每一段张力还没挨到松开的那个点，就被一个即时满足或一个新的任务覆盖掉了。张力从未被充分走完，张力也从未消失。它们在身体里堆积，互相挤压，汇成一片弥散而空洞的焦躁。

这正是抑郁症在当代的一种典型形态：不是一种具体的丧失，而是一种“一切都在运转，但什么也没发生”的窒息。当事人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他仍在积极学习、努力工作、维持社交——但他始终感到一种弥散性的空，一种浸泡在虚无里的乏力。这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压抑回归，而是假体化器官的本征苦痛：器官被摘除之后，身体仍然发出“我需要意义”的信号，但那信号找不到接收它的肌肉了。焦虑和抑郁，恰恰是这种信号撞击假体外壳的闷响。它们不是希望的消失，而是希望缺席后——一具有机体对它残存需求的、无所指向的呐喊。

由此也可以回答另一个极易被提出的质疑：如果假体化的替换是舒适的、顺滑的，人何时会有动力“撤除假体”？撤除的动力正来自这片弥散性空虚所造成的深层痛感——不是被剥夺自由的愤怒，而是某天深夜刷完几个小时的短视频之后，身体里一种无法被“再刷一条”压下去的、赤裸的不对劲。它没有抗议的对象，但它在那儿。这种“什么都没发生”的身体性察觉，是假体化时代唯一也是极脆弱的、可以朝向重建的内源性动力。它不来自一个尚存的本真主体，它来自一具曾被假体顺畅地载着走了很远，却忽然发现自己早已不在原地的肉身的茫然。

七、重建的裂隙：从机制逆转点出发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在断裂处指明了厚土尚存的地带，并在代偿的痛苦中抓住了脆弱的驱力，同时借助“正在变薄的合唱团”那样的案例标定了干预窗口的存在。重建的意义条件，不能从外部输入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不能从“如何过得好”的日常智慧中东拼西借，更不能被误读为一种回归前数字时代本真生活的浪漫主张。它必须从假体化的内在机制逆转点中，被严格地推导出来。

逆转点何在？假体的植入逻辑，如前所述，是对三联引擎在运转中最费力的那三个节点的逐一短路：茫然太费力，所以被选项填平；裁定太费力，所以被数据外包；走通弧线太费力，所以被即时满足截断。重建的方向，因此不能被笼统地表述为“恢复三重节奏”或“回归真我”——这种表述在发生学上犯了假装器官可以在真空中重新自行运转的错误。重建只能是一个更艰难的、更根本的动作：在已被铲平的社会条件中，重新创造出能让这三种“费力”不被短路、而被安放的微观环境。重建不是恢复一个旧东西，而是在新条件下重新生成一个类同的功能结构。以下是四类从机制逆转点推导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重建基础。

第一，庇护茫然不被填平。茫然是自由的孵化器。假体化的第一环就是用一个选项菜单把茫然堵住，让人不再需要承受“我不知道要什么”的难受。逆转此环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某些被刻意保护的时段与场所里，延缓、甚至拒绝让茫然立刻变成选项。一个孩子对星星好奇，不要马上帮他搜课程、买望远镜、推给他“最适合初学者的十个方向”。让他在空地里站一会儿，让那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的难受，在他的身体里多停留几个下午。一个创作者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要马上打开数据面板去看“当下什么选题火”。就让那不知道该做什么的焦灼在桌上摊着，摊到它自己开始长出草来。这不是对“本真”的回归，而是对一个已被拆除的孵化器的人为再搭建——它需要设计、需要仪式、需要参与者对“难受”的耐受共识。

第二，为前反思裁定留出不被数据穿透的暗房。创造弧线的核心——那个在混沌中反复摸索、仅凭内部感觉做出数百次微小裁定的过程——不能在数据的强光下存活。逆转此环，不是要求整个创作过程完全不看数据，而是要求在那个“还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的孵育期，刻意断开与数据面板、排行榜、点赞数的连接。数据一进来，裁定就外包。保护暗房，就是为那个还在自己手里的裁定多留几天无风的空间——这段空间不是自然存在的，它需要被有意识地从已被数据全面照亮的日常环境中划出来。

第三，恢复被截断的张力弧线。幸福需要把一件事从头走到底。假体化的第三环把弧线切成碎屑，逆转此环的方式，是在日常编排中坚定地保护“单线程深度时段”——一段不被任何通知打断的、足够完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在自己手上跑完。这不等于“慢生活”或“数字极简”，它不预设某种特定的技术程度或生活美学，它只要求一件事：有一种精神活动能进入一种深度实践的节奏，能让张力积聚、搁置、阻滞、最终在某个时刻自己释放。这种时段的创造，本身就是在已碎片化的环境中重新设计一个能让幸福弧线完整发生的容器。

第四，让连接成为共护裂隙的共振场，而非假体的同步网。连接本身不自动产生希望，但那些尚未被数据与排序中介的共在——读书会、手工作坊、不追求名次的合唱团、几个定期见面只是坐在一起的朋友——之所以能成为庇护空间，不是因为他们“更本真”，而是因为他们的连接结构中不包含即时反馈、排序排名、外部度量标准：自由敢踩路了——因为没有人打分；创造敢认路了——因为没有预设的目标要迎合；幸福能把路走完了——因为没有人中途发来下一条任务。逆转假体同步网的关键，不在于反对线上、回归线下，而在于识别和创造那些不被外部度量结构穿透的连接形式——无论它们发生在线上还是线下，关键在于度量结构是否在场。

这些是重建的基础，不是重建的细则。它们与“数字极简主义”或“回归田园”等流行话语的原则性差别在于：后者的逻辑是“远离技术、回归自然”，前者的逻辑是“从假体化机制的逆转点出发，在新条件下设计能让真器官重新被激活的微观容器”。它不怀旧，它不假设一个更纯净的过去，

它只承认一个事实：真器官需要特定条件才能运转，而那些条件在当下的社会生态中已不再自然存在，必须被人为地、有意识地重新创造出来。

八、结论：先养土，再撒种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把它要说的话推到了尽头。韩炳哲在数字资本主义将人逼入普遍性耗竭的时刻转向希望，这一转向的方向是对的——恐惧确实使人孤立，他确实看见了碎片化的田野。但本文要说的是，不是任何连接都能止住恐惧。如果被连接起来的个体，其意义器官已不再是那台能在当下跑完整条弧线的原生机体，而是一套不生产节奏、只制造“意义感”的假体，那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得到的不是希望的共振场，而是假体彼此校准的空转网。

本文因此没有回答“韩炳哲的希望转向是否有效”，而是把这根追问的针往更深处扎了一层。在那片他号召连接的土壤里，一个个体的茫然孵化器已经被推送填平，前反思裁定已经被数据外包，张力弧线已经被即时满足截断。自由、创造、幸福的弧线不是被压坏了，而是被摘除了——然后换上了更顺滑的仿真件。这项手术，本文称之为“意义器官的假体化”。假体化之后的人，仍然能积极地、高效地、充满热情地活着，但那活着的，已经不是他自己用脚踩出来的路——那是选项超市的自动扶梯在载着他走，而他以为那是风。

在这个诊断下，希望的政治如果要落地，它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喊出“希望”，而是保护那些假体还没长进去的泥土——那些纠缠得足够厚、慢得足够稠、无法被算法切碎的关系，以及在被侵蚀的地带中仍有时间窗口可被加固的缝隙。亲人日复一日的照护，朋友之间不为了展示什么而只是坐在一起的共在，一群人在房间里笨拙地做一件没人在打分的事，一个合唱团在犹豫是否要迎合外部数据的那一刻做出的“不跟”的决定——这些是意义的最后土壤。在这里，茫然还被允许在无人催促的下午漫长地孵化；裁定还在练习着不看数据就认出一条路；张力还在一道坎一道坎地被走通，弧线完整地流过身体。希望的种子，只能在这里自己长出来。

因此，本文要说的归根到底只有一句：先养土。不是先把希望喊出口，是把那个能让希望自发生长的土壤——让孩子蹲在河滩上、不为任何奖赏地捡起一块石头、端详、放下、再拿一块——还给每一个孤立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希望就是一句口号。做得到这一点，希望就不需要被喊——它在一个孩子蹲在河滩上、不为任何奖赏地捡起一块石头、端详、放下、再拿一块的时候，就已经在土里了。

本文的核心判断可以被两条反例推翻。第一，如果在一个被本文描述为高度算法中介的环境里，大多数人仍能自发地、不需要刻意保护地完整跑完三重节奏——在推送之外频繁自创新路、在外部给定目标的日常里持续认领属于自己的创造、在被即时满足填满的节奏里大量体验张力被完整走通的幸福——那么假体化便不是普遍的结构性的替代，本文从根上便是错的。第二，如果一个长期在假体联动中运转的个体，被移入一个没有了推送、没有了即时反馈、没有选项菜单可以依赖的日常处境后，能在短期内自发地从内在长出茫然中的探索、混沌中的裁定、张力中的韧性——也就是三重节奏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自己重新转起来——那么本文的假体化诊断应被撤回：那意味着它并非不可逆的器官替代，而只是一层可以被剥离的习惯沉积。这两项证伪路径，是本文判断站得住还是倒掉的岔路口。

九、理论对话：假体化诊断与既有框架的不可还原分离

任何一个新的判断，如果不能用清晰的方式说出它与先行者之间的分界，它就有理由被目为一次修辞上的换皮。本节对本文的假体化诊断做出几项不可省略的划界工作。

（一）与马克思异化传统的分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其核心结构是：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劳动）外化为产品，产品反过来支配劳动者，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此后经卢卡奇的“物化”至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这一传统共享着一个预设：那个被异化、被压扁、被整合的主体，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未被摧毁的存在。革命或变革一旦拆除了外部压迫结构，被压抑的主体将会恢复，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这是一种压抑—解放的叙事，它所设想的敌人是外部的，它所期待的是主体的苏醒。

假体化诊断退出这个叙事。它说的不是“外部结构压迫了主体”，而是“那台能让主体成为主体的器官本身，在结构上被更顺手、更高效的仿真件替代了”。马克思的劳动者在异化中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劳动中不像人；假体化中的人却在整个替代过程中体验着一种被选项、被数据、被即时反馈环抱的绵密舒适。前者的出路是反抗，后者的困境是连反抗的器官都已不在了。两者给出的经验预测截然相反：若异化论成立，那么一场剧烈的制度变革之后，被压迫者应当能迅速恢复意义发生的能力，因为他的本质从未被取走；若假体化诊断成立，那么压迫结构撤除之后，那个人会陷入深刻的“功能真空”——没有压迫者了，但他也找不到那条自己踩路的腿了，因为他从未在那条腿上长过肌肉。判准不在理论，而在一种大规模的、被观察到的“解放后不会走路”的形态是否在特定群体中出现。本文无意覆盖整个资本主义史，但它在那些已被重度数字替代的领域里，要求为这种可能性留出一格诊断的空间，而这正是异化叙事所无法提供的。

（二）与斯蒂格勒器官学的分离——器官被摘除，还是知识被夺走？

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器官”与“假体”这两个词恰好是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核心概念。在《技术与时间》系列中，斯蒂格勒论证了人与技术之间的根本性“义肢性”：人没有先于技术的“本质”，人类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技术外化自身的器官——从燧石手斧到文字，再到今天的数字网络，技术是人的“第三持存”，不断重新编织人的记忆、感知与未来。斯蒂格勒并不把技术视为人的对立面，而视其为人之为人的原始条件。技术延伸了人，而不是替代了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化”概念：当知识被外置于技术装置中，个体失去了know-how，不再知道如何自发生存、感知、创作——知识被夺走了。他的整体取向是一种悲剧性的乐观：数字技术固然带来了无产阶级化，但同时也提供了新的“重新占有”的可能，只要个体能进入一种“贡献式”的实践。

本文的假体化诊断与斯蒂格勒之间，必须做出一场比初版更深层的分离。因为初版已经指出了分离线——斯蒂格勒的义肢是可重新占有的透明工具，假体是不允许拆开、只有操作权没有修改权的封闭机器——但这个分离仍然让读者有理由追问：斯蒂格勒自己也承认，数字平台正在关闭重新占有的可能性（他在晚期著作中反复警告“算法治理性”正在消灭知识）。那么，本文所说的“假体”与斯蒂格勒所说的“夺走知识的坏义肢”，究竟有什么不同？

本文的回应是：区别不在“夺走”的程度，而在被夺走的东西的本体论层级。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夺走的是know-how——“如何做”的知识。农民失去了种地的知识，手艺人失去了制作的技艺，这是一种技能层面上的剥夺。本文所命名的假体化，摘除的则是比know-how更基底的一个层级：the organ of orientation——一个能在内部产生“该往哪做”“这值不值得做”的裁定器官。农民失去了种地的know-how之后，他仍然能对自己说“我想种地”——因为这欲望来自他身体里的方向感器官。这个器官没有被夺走，它还在。他需要一个能教他种地的师傅，但他不需要一个能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种地”的师傅——因为那个“为何”是他的器官自己产生的。假体化要命的地方在于：它连这个“为何”的产生能力都替代了。选项界面不是因为夺走了你的知识而让你不自由——它是在你还没生出“我想去哪”之前，就已经把目的地预先填好了。数据外包不是因为让你失去了创作的技艺而让你远离创造——它是在你还没反复摸那块石头、还没用自己的裁定认出“就是它了”之前，就已经把“它应该是什么”的答案告诉你了。因此，被摘除的不是技能，而是意义发生的内部方向源。

分离线可以借助一个判准句来落地：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使人“不会做”，假体化使人“不会想”——不是不会思考，而是不会产生那个“我该往哪想”的前反思裁定。前者的修复路径是重新学习技能（再占有），后者的修复路径是重建裁定器官能被激活的条件——那需要更慢的时间、更厚的茫然、更不被外部度量标准穿透的空间。二者在本体论层级上不同：一个是知识的外置，一个是方向感的废除。

（三）与高兹“非物质劳动”批判的分离

安德烈·高兹在其对“认知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论证过：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中，资本不再仅仅剥削体力劳动，而是将人的情感、关系、沟通能力变为生产工具。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异化，已经非常接近本文所说的“将意义器官工具化”。读者有理由追问：假体化是否只是高兹“情感劳动异化”在数字平台上的延伸？

本文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实质差异。高兹批判的核心，是资本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与关系能力征用为生产工具——你善于倾听、善于共情、善于营造氛围，这些能力被转化为服务业或创意产业中的“情感劳动”，在此过程中被商品化、被规范化、被异化。但高兹的分析预设了这些能力在被征用之前是完整的、属于个体的——它们是被“拿走”的，而不是被“替换”的。

假体化诊断则指向一个更进一步的形态：当数据和算法足够强大，资本不再需要征用你的情感能力，它可以转而直接提供一套功能仿真的假体来替代它的运转。你不再被要求“对客户微笑”——聊天机器人与标准化话术库已经替你完成了情感连接的功能输出。你不再被要求“用你的关系网络为公司创造价值”——平台算法已经通过推荐系统替你完成了人际匹配的功能输出。高兹所描述的，是资本对你真实器官的征用与榨取；本文所描述的，是资本在征用了足够多数据之后，建起了一套比你自己的器官更高效、更准确、更不费力、也更不允许你拆开修改的假体系统，让你的真器官从“被榨取”走向了“被闲置”——然后走向萎缩。征用仍然需要你的器官在场，替代则不再需要你。

（四）与其他框架的简短划界

与自我决定理论的分离：Deci与Ryan的自我决定理论将自主性、胜任感、关系感界定为三大基本心理需求，其底层叙事是“侵蚀论”——内在动机本就存在，只是被外部奖励与控制性环境侵蚀或挤

出了。假体化不在这个范式之内。它说的是：真器官（而非“需求”）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长出来，或者长出来后会被摘掉了，但摘掉后并非留下一个空洞，而是植入了一套功能仿真的替代物。侵蚀论预测：一旦移除控制性环境，内在动机将回弹。假体化预测：移除之后，那个人停在原地，不是等别人给他自由，而是在等别人给他选项。判准是：若长期在算法主导环境中成长的个体，被移入资源匮乏但需要自己碾路的新处境后，短期内能自发恢复内在探索动机与完整节奏感，则本文应被侵蚀论替代；若其第一反应是瘫痪——不是被剥夺了自由的愤怒，而是不知道没有菜单该怎么迈腿的茫然——则本文成立。

与心流模型的分离：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模型正确识别了一种与三重节奏运转时极其相似的巅峰体验形态，但它将“清晰的目标”不加追问地接受为沉浸的条件，并不问这个目标是外部指定的还是自己在混沌中认出的。本文论证：恰恰是这个区分，构成了创造弧线是否在运转的分水岭。一个人可以在拼一幅外部给定的、十级难度的拼图时进入深度心流；但他拼完之后不会看着那幅拼图说出“这就是我做的”——因为“它应该是什么”这个裁定从来就不是他做的，他只是一名技艺精湛的执行者。判准是：若仅凭外部指定的目标，通过技能与挑战的精准匹配，就能产生与自发生成的目标同等深度的认领感与存在充盈，则本文的三重节奏框架应被修正；若外部目标仅能产生沉浸与满足，却不能产生“这是我的”的身体确证，则本文成立。心流模型的这一不可分辨性，恰恰是假体联动得以伪装自身的关键之一。

与Ehrenberg的分离：Ehrenberg在《疲于做自己》中诊断了当代抑郁症的激增：不是压抑的增加，而是“必须成为自己”这一社会规范成为强制性命令之后所引发的普遍性耗竭。假体化诊断与Ehrenberg共享对当代主体困境的敏感，但它在着力的层级上不同：Ehrenberg的着力点在社会规范——你被要求“做自己”而力竭；假体化的着力点在器官——那具能做自己的器官所必需的底层条件（不被中断的时间、不被替代的裁定、不被截断的弧线）已经被平台结构系统性铲平，因此不是“你想做自己但做不到”，而是“你用来做自己的那套装置已经不在了，你所能做的只是用假体模拟一个自己”。判准是：若在一个显著降低了自主性社会规范的实验环境里，个体的三重节奏与意义感能同步恢复而无需专门干预其数字媒介使用结构，则本文可被Ehrenberg的规范论替代；若规范压力解除后，个体仍呈现意义空洞，则本文成立。

（五）技术、资本与政治经济学的交互——一个自我限制

本文在行文中反复将假体化定位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而非单纯的技术变迁中。在此必须正面澄清一个本文没有能力单独完成、但必须诚实地标注为未竟工作的维度：假体化的驱动力是技术逻辑、资本逻辑、还是二者的耦合？本文给出的答案是耦合——选项界面、数据外包、即时满足这三类假体，无一不是技术架构（推荐算法、实时数据面板、反馈机制）与资本增值压力（注意力竞争、用户留存率、内容变现效率）共同塑造的产物。算法填平茫然，不只是因为它能做到，而是因为一个不在茫然中停留的用户能更快地被转化为有效的浏览时长与消费行为。数据外包替代裁定，不只是因为它更准确，而是因为一个不依赖内部感觉的创作者能更稳定、更大批量地生产可预测地盈利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假体化是技术与资本的共谋——技术提供了手段，资本提供了加速度。但本文的篇幅与分析方法（概念性/发生学分析）决定了它无法对这一耦合的内部结构做更完整的拆解。这一任务是本文必须留给政治经济学进路的后来者的。本文在此只能对自身在因果链条上做出一个诚实的限

制：它完成了假体化在器官层面的发生学诊断，但尚未完成这一诊断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充要性论证。

注释

-
- [1] 本文所涉全部日常场景与案例（如第二节的“孩子捡石头”，第五节的“照护关系”和“社区合唱团”等），均为说明理论逻辑而构造的思想实验或基于真实案例的典型化重构，不代表任何系统性的田野调查或经验数据。为突出机制，这些场景经过了典型化、简化和匿名化处理。“社区合唱团”的案例受若干实际观察启发，但细节已做通用化处理，不指向任何具体团体。
- [2] “意义器官的假体化”这一核心概念，受马克思异化论与斯蒂格勒技术器官学的双重启发，但如第九节详述，本文在诊断路径与关键结论上与两者均形成原则性分离。此处的“器官”“假体”均为分析性比喻，不指向生物学或医学意义上的实体。
- [3] 本节关于“厚土”与“假体不长之地”的讨论，旨在标示假体化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均等分布，属于理想型分析，而非量化的分层描述。其目的不是区分“真实的”与“虚假的”生活形式，而是指明某些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慢、厚、无可替代）使假体难以拟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解释，而非价值性的颂扬。所举照护关系与合唱团等例示同样为经过典型化的说明性建构。
- [4] 本文对斯蒂格勒的引用主要基于《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义肢性分析，对其后续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化”与“算法治理性”的论述，在第九节中做了延伸对质。本文与斯蒂格勒的核心分歧在于“器官被摘除”与“知识被夺走”之间的本体论层级差异，详细论证见第九节（二）。

参考文献

-
-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Deci, E. L., &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Plenum Press.
- Ehrenberg, A. (1998). *La Fatigue d’être soi: Dépression et société*. Paris: Odile Jacob.
- Gorz, A. (2003). *L’Immatériel: Connaissance, valeur et capital*. Paris: Galilée.
- 韩炳哲. (2010). *倦怠社会*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Berlin: Matthes & Seitz, 2010). 中译本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韩炳哲. (2014). *精神政治学* (Psychopolitik, 2014). 中译本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韩炳哲. (2024). *Der Geist der Hoffnung*. Berlin: Ullstein.
- 卢卡奇. (1923). *历史与阶级意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马尔库塞. (1964). *单向度的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马克思. (184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斯蒂格勒. (2000). *技术与时间* (第一卷: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裴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附论一·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本节由编辑增补，不属作者原稿。评分时按严格的全球库口径检索最近邻，发现本文有两个未被正文请上桌的对手；它们不削弱本文的判断，但本文的不可还原性主张必须先要在它们面前站住。以下逐条给出：该对手已经走到哪一步、分离线在哪里、以及一个能把两边分开的判决性对照预测。

1. 伊里奇的「根本性垄断」(radical monopoly)

它已走到哪一步。伊里奇在《自主共生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 1973)中论证：工业化生产的商品伤害人，不是靠垄断市场份额，而是靠垄断“满足某项需要的方式”。汽车不只是击败了别的车，它让“走着到达”这件事在被它重建过的城市里不再可能；医疗体系让“自己照料自己”失去条件。这不是压迫，是替代，而且被取消的正是人自主做同一件事的能力本身。这与本文“假体替代真器官”是同一台机器，且比斯蒂格勒更近——斯蒂格勒讲的是知识被外置，伊里奇直接讲**能力的条件被取消**。正文与马克思、斯蒂格勒、高兹、自我决定理论、心流模型、埃伦伯格六家逐一交手，唯独漏了这一家。

分离线。分离线落在**被垄断的是“做法”还是“方向”**。根本性垄断作用于手段：它让某项需求只能以一种方式被满足，而需求本身（我要去那里、我要健康）仍由个体产生。本文的假体化再往下一层：连“我要去哪”这个需求的生成能力本身，都被选项界面预先填好了。伊里奇的病人还知道自己想健康，只是不会自己照料；假体化的人不再产生“我想做什么”这个前反思裁定。

判决性对照预测。撤除装置之后的第一反应。根本性垄断预测：把车与医疗撤走，人仍有明确的目的（我要到那里去），只是缺手段，于是会去寻找或重建手段——走路、互助、土办法。本文预测：撤走推送与选项之后，主体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找替代手段，而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瘫痪不发生在手段端，发生在目的端。若在高度假体化的群体中，撤除后普遍表现为“知道要去哪但不会去”，那么本文就应退回伊里奇的框架，假体化只是根本性垄断在数字领域的一个例子。

2. 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异化

它已走到哪一步。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1958)中主张：异化的根源不在所有权，而在**人与技术物之间知识关系的断裂**——技术物变成不可打开、不可理解的黑箱，使用者退化为纯粹的操作者。本文对“假体”的定义（“不允许拆开、只有操作权没有修改权的封闭机器”）几乎逐字复述了这一诊断，而正文只对话了他的学生斯蒂格勒，没有对话他本人。

分离线。分离线落在“把黑箱打开是否就够”。西蒙东的处方是技术文化——重建人对技术物运作方式的理解，异化即告解除。本文的判断是：**即使一个人完全理解推荐算法如何工作（写这套算法的工程师本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茫然孵化器、前反思裁定与张力弧线仍照样被同一套结构铲平。**被摘除的不是关于装置的知识，而是使用装置的那具身体所处的时间与关系条件。

判决性对照预测。按技术理解程度分组。取一批对推荐系统有完整技术理解的从业者与一批没有此种理解的普通用户，在同等使用强度下比较三重节奏的完整率（茫然耐受、前反思裁定、张力走通）。西蒙东框架预测：理解组显著更高，因为知识关系未断裂。本文预测：**两组无显著差异**，因为决定性变量是时间—关系结构，而非知识关系。若理解组显著更好，本文即应被西蒙东的知识断裂说吸收。

附论二·与站内既发论文的划界（编辑增补）

作者站上已有《假体之伪生：机器人伴侣如何从消除他人的“抵抗”开始，瓦解爱得以发生的基底》（之三十五），与本文共用“假体”这一命名与同一台机器：**消除费力／抵抗** → **瓦解某物得以发生的基底**。正文未提及这一篇，编辑在此补上划界。

分工在阻抗的位置。《假体之伪生》的作用点是**他者的抵抗**——爱的发生需要一个不受我支配的他人，机器人伴侣把这个抵抗消除掉；本文的作用点是**自我的费力**——茫然、裁定、张力，是主体内部的三处耗费。前者拆的是关系里的外部阻抗，后者拆的是身体里的内部阻抗。

共享的上位判断。两篇共享一个更上位的判断：**发生需要阻抗**。但阻抗的位置不同，实验场也不同——一篇的实验场是二人关系，一篇的实验场是一个人的一天。故不可互相替换。

给读者一个判据。删去“假体”这个词之后，《假体之伪生》还剩“消除他者抵抗即取消爱的发生条件”，本文还剩“三处费力被顺滑件短路即取消意义的发生条件”。若读者发现本文的论证在换成前者的关系框架后仍然成立，那么本文就应并入那一篇。

另需提醒的同名不同义。同日本站另有陈晓艳《缝补的假体：论“认知预热”与主体性的代偿性坏死》。“假体”一词目前已由两位作者在三种不同意义上使用（关系中的替身、意义器官的仿真件、认知的代偿件），读者宜按各篇自身给出的定义读，不要跨篇挪用。

附论三·编辑校订说明（编辑增补）

本文在发表前经过一次以可核验性为唯一目标的校订。为了让读者能够分辨哪些是作者的、哪些是编辑的，所有改动逐条列出如下。

- 参考文献中《倦怠社会》的出版社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更正为中信出版社（2019 年中译本），并补上德文原著信息（Müdigkeitsgesellschaft, Matthes & Seitz, 2010）——原条目把德文原著年份与中译本出版社写在了一起。

- 《精神政治学》条目补上德文原著年份 2014（原条目所标 2019 为中译本年份）。

- 除以上两处参考文献的著录更正外，作者正文一字未改。附论一至附论四均为编辑增补，与作者原稿分开陈列。

附论四·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编辑增补）

以下条目为编辑在增补附论一与附论三时核验，非作者原稿所引。

Illich, I. (1973). Tools for Convivi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Simondon, G. (1958). Du mode d' 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 (英译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Univocal, 2017)

Han, B.-C. (2010).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Berlin: Matthes & Seitz. (中译《倦怠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